

一部代表中西文化交流史 新趋向的力作

——评《官府、宗族与天主教：

17—19 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

□董少新

近十余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从原来关注文化交流的过程,逐渐开始重视异文化交流后所产生的结果,具体到中国天主教史领域,则是天主教在华的本土化、地方化以及各阶层中国教徒的信仰、思想与生活越来越成为研究的重点。黄一农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章文钦的《吴渔山及其华化天学》、钟鸣旦的《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等,均是近年来这一新的研究趋向的代表性著作。

明清以来,在中国许多地方形成了天主教聚居区,历经多次禁教和战乱的冲击,有些天主教村落一直存在至今,例如鄂西北、闽东、浙南和四川等地都有天主教聚落,且其历史均可上溯到明清时期。这些天主教聚落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其与官方和地方社会的关系,以及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为我们研究中国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难得的案例,且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兴趣,最近几年已陆续有相关论著问世。而2009年出版的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张先清先生的《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一书,是中国天主教聚落历史研究的代表。这部著作起码有三方面的突出贡献:

首先,在研究视野上,该书选取长期被学界忽视的闽东乡村教会作为研究对象,突破了以往仅重视著名人物、耶稣会及“西学东渐”的研究框架,首次将研究视野向下转移,关注中国底层

社会的普通教徒,揭示了他们在天主教义与中国民间传统礼俗双重影响之下的生活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奉教宗族、非奉教宗族、地方政府及天主教不同修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该书所呈现的历史事实表明,天主教已经扎根于中国民间的某些区域,对地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形成了“中国天主教”。普通百姓信徒绝非以往所认为的那样,仅是一些为实际目的而入教的、信仰不坚定的“吃教”之辈,而是一个数量较大的牢固的信仰群体。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历史学和文献学之外,该书还引入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作者在福安地区作了长期的田野调查,访问乡耆,整理了大量口述资料;与当地教徒家庭一起生活,获得了数量可观的族谱文献;实地观测与考察,拍摄了一批实物、教堂等图像资料;发放问卷,普查当地居民的信仰状况,得到客观的研究数据。凡此均为此项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另类资料。这是以往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甚少使用的新方法。

再次,该书所运用的史料颇具特色。为了阅读多明我会的原始资料,作者曾特意赴北京学习西班牙文。尽管在西文资料的使用方面,作者尚无法与西方相关学者抗衡,但是该书中大量征引的袁若瑟(José María González)的《多明我会在华传教志》(五卷本巨著,收入多明我会原始文献甚多)、利胜的(Victorio Riccio)《多明我会在中华帝国之业绩》等书,已大致够用。而作者所使用的大量独具特色的中文史料,却是西方学者难与匹敌的。这些史料主要包括中国官府档案、族谱文献、地方志以及口述资料、教徒履历、碑刻、歌谣等,尤其是族谱文献,除了方豪曾略有涉及之外,以往甚少为研究者所用。作者通过长期的田野工作,收集到一批奉教家族的族谱,其中为该书所征引者达30余种。透过这些文献,该书不仅重建了奉教宗族的历史发展脉络,而且揭示了天主教信仰与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的奇妙结合。该书史料运用的另一特色是,充分利用中西文两方面的史料加以相互参证,并多有发明。比如对于西文文献中出现的大量以西文拼写的人名、地名,尽管其中大部分名不见经传,但是作者都能够依据方志、族谱等文献一一加以考订,绝大部分获得还原,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西文文献相关部分的可靠性并增加了其史料价值,而且也为此段历史的真实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该书共计五章,为我们展现了两百多年中闽东地区乡村教会的历史发展画卷。第一章从环境、社会结构、灾害、寇乱与地方社会、早期宗教信仰等方面,先让读者了解福安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二章以时间为经,官府与天主教之关系为纬,描述了官府在天主教传播过程中的态度变化及其对乡村教会发展的影响。多明我会是明末以来入华的三大天主教修会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遗憾的是至今中文学界没有一部多明我会在华传教史问世,甚至我们对许多来华的多明我会士的名字都甚感陌生。因此这一章的叙述,虽然以福安为中心,但以西文资料为基础并参考中

文文献,基本上勾勒出了多明我会华传教的历史框架,对中国学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从这一章的叙述中可见,天主教在闽东地区已经扎根,且发展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历次严厉禁教的情况下,当地的天主教为何屡禁不止呢?这是该书接下来几章所要回答的问题之一。

第三章从数量、构成和分布三方面对明清时期福安乡村天主教会群体内部结构进行了细致考察。作者将福安天主教的发展分为奠基(1632—1648)、拓展(1649—1746)和稳步发展(1746—1846)三个阶段,其中在第二阶段,该地区的教徒人数已经突破万人,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教徒群体。该群体包括举人、贡生等上层士绅,也不乏生、监、吏员等下层士绅,而主体则是乡村农商百姓。该地区教徒分布十分广泛,有教徒的村庄超过300个,形成一个由核心村、亚核心村和边缘村构成的天主教网络。作者在这一章中不仅考证出福安奉教士绅30余人的姓名,而且还罗列出特定年份各个村落的教徒人数等数据,成为分析福安天主教网络的主要依据。

第四章“宗族与宗教网络”是全书最为精彩的一章。在这一章中,作者通过顶头黄氏、穆洋缪氏、双峰冯氏、溪填赵氏等个案,深入分析了基层天主教网络的基本单位——宗族及其与天主教之关系。宗族是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最重要构成单元,外来宗教若要在基层社会传播,不可避免地要与各地宗族发生关系。但实际上,天主教与宗族之间多有隔阂,比如天主教要求一夫一妻制,这与宗族人丁兴旺的传统诉求相抵触;多明我会士禁止中国教徒祭祖拜孔,这直接冲击到宗族的核心价值;且传统中国宗族的信仰世界多为佛、道乃至各种民间信仰的混合体,而天主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唯一性,难以与宗族固有之信仰系统相融合。天主教在福安地区传播的过程中,的确发生过奉教宗族与非奉教宗族之间的矛盾,也出现过宗族内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冲突;在宗族传统核心价值受到天主教威胁时,即使已皈依的宗族亦曾以全体脱教为威胁,以维护传统。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即福安地区天主教经过两百年的发展,有许多地方大族的所有成员都皈依了天主教,成为所谓的“转化型天主教宗族”;还有一些宗族有部分成员皈依天主教,从而成为“兼容型天主教宗族”,而且此类宗族并未因信仰上的分歧而解体或分裂。对此,作者通过具体案例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解释。作者认为,明清时期天主教已经逐渐融入到福安地区的许多宗族之中,成为宗族认同与护佑族人的信仰体系,且正是借助于传统宗族对天主教的接受、继承与保护,天主教信仰方得以根植于福安的基层乡村社会中,即使屡遭官禁,亦绵延不绝,并成为福安民间的主流宗教。天主教传播的宗族依附性,是福安乡村教会发展的显著特征。本章关注的重点在于宗族对天主教传播的有利因素,但亦存在以宗族为主的反教案例,例如上杭陈氏、卓家坂王氏等,均曾是反对天主教传播的主要势力。作者对此亦有涉

及,但似乎可以进一步阐发。

第五章“信仰与生活”亦十分出色,作者通过村落信仰中心的重组、妇女守贞观念的移植、宗族通婚网络的变迁三个方面,探讨天主教信仰对乡村宗族日常生活的影响,呈现出天主教传入后福安社会的一种异文化交织的生活景观:传统乡村社会内部已经植入了不少新的文化内涵,旧有的村落信仰空间为天主教所增补;在宗族原有的儒家贞节理念框架下又融入了天主教妇女守贞观;传统宗族通婚网络也随着天主教的渗入而发生摆动,呈现出一种信仰圈与婚姻圈叠合的趋势。作者以坚实的论据证明,明清以来福安存在着双峰冯氏、溪填赵氏这类因皈依天主教而被多明我会士严格禁止举行祭祖活动及其仪式的天主教宗族,不仅对以往的宗族研究理论提出了挑战,而且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悖论现象:一方面,多明我会士严格禁止祭祀祖先;而另一方面,福安许多教徒入教的原因却是祖宗入教、后辈继承,家族式的信仰传承是天主教得以在该地区延续的重要原因。天主教传入后对乡村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丧葬礼俗、教育、慈善、经济、家法族规等,可能都发生过文化交织、演变的现象,在这些方面似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张先清的这部著作回应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注重交流结果的新趋势,以福安天主教聚落为例,为我们呈现出西方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对地方社会造成的影响和引发的变化。中国社会在历史上并非一个封闭的整体,外来宗教、文化与科技等不断传入中国,在中国产生影响,并引起中国本土社会、思想、文化和风俗等方面的某些变化。不仅如此,来华的各种异域文化之间,也会在中国的社会空间中互相影响与演变。文化交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利用新方法、新资料并具有新视角的研究问世。

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